

書評：
通識教育中的公民能力
——M. Nussbaum《培育人文》一書評介

Book Review:
Civic Capacities in Liberal Education:
Cultivating Humanity

方永泉

Yung-Chuan Fang

Author's Correspondence Information

作者通訊

方永泉 **Yung-Chuan F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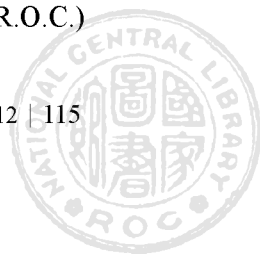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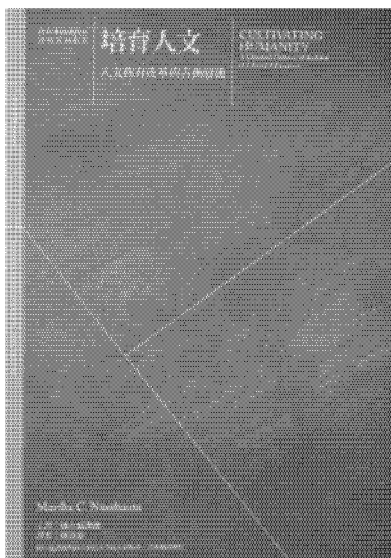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No.162, Sec. 1, Heping E.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10, Taiwan (R.O.C.)



通識教育中的公民能力 ——M. Nussbaum《培育人文》一書評介



書名：培育人文——人文教育改革的古典辯護

作者：Martha C. Nussbaum

出版社：政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

壹、前言

作為哲學的學習者，看到 Nussbaum 這本《培育人文——人文教育改革的古典辯護》(Cultivating Humanity –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 (以下簡稱《培育人文》) 一書後，必然會生出驚喜之感。在哲學此一學科地位因其實用性而備受挑戰的今日，目睹著 Nussbaum 仍然為了哲學科目在大學通識課程之中的地位奮戰著，甚至還將哲學教育提升到了另一個高度，使得哲學成為「涵養人性」的基本學科，著實令人感到興奮且印象深刻。

Martha C. Nussbaum (1947 年生) 是當今美國最知名的哲學家之一。筆者原先對她的認識，是來自於其在 2006 年所出版之《正義的界限》(Frontiers of Justice) 一書中對於 John Rawls 正義理論所作出之修正，在《正義的界限》中，Nussbaum 針對 Rawls 正義理論所未能解決的幾項難題 (包括殘障人士、全球正義以及動物正義等)，進行了「能力取向」(capabilities approach) 的調整或補充，可說是一次極



有開創與見地的嘗試，讓人很容易以為她是一位深造有得的政治哲學家。不過在翻閱了《培育人文》(原著於 1997 年時出版)這本稍早出版的著作後，筆者才了解到，原來 Nussbaum 不只是位關懷人權與法律的政治哲學家，更是一位對於宗教及文學都有著精深造詣的倫理學家；在學術的系譜上，Nussbaum 的哲學思想應該是扎根於古代希臘及羅馬的哲學（尤其是斯多噶學派的倫理學），而這樣的思想淵源也造就了 Nussbaum 在面對著保守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雙重夾擊時，依然能夠堅守其批判性的倫理普遍主義（ethical universalism）¹ 的理性立場，並且為哲學教育作出了有力的辯護。

貳、本書的目的——建立「新的」博雅教育

《培育人文》² 一書，按照 Nussbaum 本人的說法，主要成書於她本身關於美國高等教育的體驗。作為一位知名的學者，Nussbaum 有許多的機會至美國各大學進行巡迴演講或上課，有時還能在各校園內待上兩三天，以親身體會該校的學習生活計畫。除了上述的經歷外，為了對於美國高等教育的理解能夠更有系統，更能聚焦，Nussbaum 還選擇了 15 所足以代表美國各類大學與學院的教育機構，作為探究的「核心團體」；透過第一手資料的蒐集方式，對於各該學校的通識教育之實施狀況進行深入的研究。而《培育人文》一書，正是 Nussbaum 此一研究成果的具體展現。

在本書中，Nussbaum 所持的論點可謂十分明確，那便是她主張在今日的高等教育中，有三種能力（capacities）是吾人於培育人文時所不可或缺的。首先，是「蘇格拉底式的自我檢驗」，也就是「批判地檢討自己和自己的傳統的能力」。其次，是「世界公民」，也就是「將自己看作是與所有其他人休戚與共的『人』」，並且能夠「承認別人，關心別人」的能力。第三項能力，則是「敘事的想像」，也就是「能夠閱讀別人故事，站在別人的位置去進行想像」的能力。本書的前三章即在鋪陳此三項主要的公民能力，而第四章至第七章則闡述美國大學中與多元文化有關的通識課程，包括「非西方文化研究」、「非洲裔美國人研究」、「婦女研究」以及「人類性行為研究」，第八章則將焦點置於教會大學的身上，探討教會大學有無可能實施蘇格拉底式的自我檢驗之可能。至於在結語部分則以「『新的』博雅教育」(The “New”

¹ 在《培育人文》一書的中譯本中，導讀人苑舉正將 Nussbaum 的哲學立場稱為「倫理普遍主義」。

² 本書的原名為 *Cultivating Humanity*，從字面上看，似譯為《培育人性》較為適合，惟以內文所言，Nussbaum 認為其所談的主要仍是人文（博雅）教育，故本書的中譯本將其譯為《培育人文》，而為了便於讀者參照中譯本，為免生混淆，故先從中譯之書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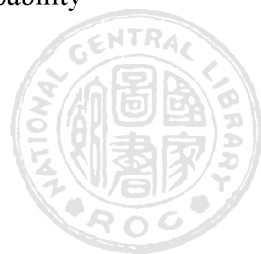


Liberal Education) 爲名, 明確標舉出所謂「新的」博雅教育, 除了蘇格拉式的批判思考與相互尊重之外, 更是一種強調對其他團體及文化有所理解的多元教育。

參、本書的優點

從 Nussbaum 的學術背景來看, 她確實是捍衛當代大學精神及其博雅教育古典價值的最佳人選之一, 在本書中她所闡述的三項基本公民能力, 架構十分明晰, 對於當前高等教育的實施定可提供相當的啓發。

而從筆者的角度來看時, Nussbaum 其以「培育人文」爲教育目標的論述更具有下列的優點: (1) 她追溯了西方哲學及教育傳統中最重要的思想源頭, 也就是蘇格拉底所探問的哲學問題及所使用的方法, 將此一作爲人類「求知」及「認識自己」之典範原型的自我批判與反思精神, 重新體現在現代的高等教育中, 就此來看, Nussbaum 直可視爲西方哲學傳統的強力捍衛者。是以她所主張的三項公民能力, 除了具備現代社會的意義外, 更兼具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2) 她重新詮釋了希臘化時代斯多噶學派的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 並且將其擴大爲「世界公民」的概念, 對於一向將斯多噶學派之主張侷限於「禁慾主義」看法的人來說, Nussbaum 的詮釋可以提供當代學者認識斯多噶主義的另一扇窗口。她能結合自己的學術興趣、思想根基於當代教育問題的剖析上, 讓其教育學說在實用價值外, 更具備了理論的深度。(3) 其對於「敘事想像」的重視, 一方面呼應當代學術的潮流——如歷史學中有所謂「敘事的復興」(revival of narrative), 哲學中亦有所謂的「修辭的革命」(rhetorical revolution) 之語——拉近了哲學、文學與教育間的距離。另一方面, 她透過文學藝術作品來增進學生設身處地的想像力與同理心的作法, 也強化了藝術在高等教育中的合法性地位, 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大學教育中往往過度地重視「智識」的缺失。(4) Nussbaum 所主張的三項公民能力並非「分立的」三項能力, 而是一個彼此相關, 具備組織性的整體。以敘事想像的能力來說, 其實可以透過對於其他文化進行探究 (世界公民) 的能力獲得增強, 而這兩項能力又皆可藉著自我檢視批判的能力得到深化; 而當一個人能夠對於異文化有所理解, 對於他人的心理亦能夠有所同理及想像時, 其自我批判反省的能力無疑也將更爲深刻。筆者的剖析是, Nussbaum 所論的這三項能力分別涵蓋了人面對自己、人面對世界以及人面對他人三個不同的面向, 而這三個面向又皆以「人性」爲核心, 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5) Nussbaum 以「能力」(capacity) 或一詞來界定大學教育或通識教育的目標, 此與目前教育界在列舉教學目標時多從「能力本位」論述的趨勢相符, 同時似乎也預示了 Nussbaum 在其後之《正義的界限》所發展出來的「能力取向」(capability



approach)³ 正義觀。Nussbaum 除了從自身所長的古希臘羅馬倫理學汲取養分，將其運用在實際的教育問題分析外；也能夠發展出首尾相應的一家之言，拓展視野於更廣泛之社會正義問題的關照上，相當不易。

肆、一些論點的討論

《培育人文》一書固然言之有物，擲地有聲，立場明確，然而後者也構成了本書引發諸多討論的原因。鑑於 Nussbaum 本人的影響力，加上這本書同時迎戰了保守主義及後現代主義兩個陣營，因此在出版後，便有不少的學者對該書進行了評論，其中包括了著名的教育哲學家 N. C. Burbules (1999) 在內。

筆者在閱讀了本書後，除對於前述的諸多優點深感佩服外，惟也願在此提供自己對於 Nussbaum 在本書中一些論點的討論，並且以一位教育工作者及哲學愛好者的身分，嘗試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就教於方家。以下即擬分為兩個部分進行討論，一是 Nussbaum 有關於哲學史（其中還包括了教育史）的詮釋問題；另一則是有關 Nussbaum 所提出的三項公民能力之教育目標的問題。

首先在哲學史（及教育史）的詮釋問題方面，前曾述及，Nussbaum 在哲學立場中所抱持的是倫理普遍主義，這種倫理普遍主義並非從「標準答案」作出定義，而是經過不斷理性論辯過程討論出來的結果。Nussbaum 主張，任何涉及倫理議題的討論，都不能限於編狹的區域主義（parochialism），而應當普遍納入所有人的考量。基於此種倫理學立場，除了蘇格拉底外，Nussbaum 還似乎較為偏好犬儒主義者 Diogenes，以及斯多噶學派的學說。在 Nussbaum 的定位中，蘇格拉底與柏拉圖截然不同，蘇格拉底是民主政治的擁護者，柏拉圖則是貴族及菁英政治的捍衛者。若將蘇格拉底所使用的理性論辯、概念澄清等典範的哲學方法視為民主政治中的重要素養，固然無可厚非，然若因此認定蘇格拉底即是民主人士（democrat），此亦可能簡化了哲學史上有關「蘇格拉底是否為民主人士」的著名爭議。按書中所引註的文獻及 Burbules (1999) 的分析，Nussbaum 此一論證主要係根據 G. Vlastos 在其著作《蘇格拉底：反諷者及道德哲學家》（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一書的說法，認為蘇格拉底並不憑藉任何公民自己信念以為的知識，並將民主視為可行的政府形式中最好的；惟此一說法，似乎也非哲學界對於蘇格拉底的主流詮釋。

³ 按王俊斌（2007）的解釋：Nussbaum 的「能力（潛能）取向」理論考量的是「到底什麼才是人們真正地能去做以及真正能夠過的生活？」之問題，這種理論是以人類尊嚴、讓人類得以過著有價值尊嚴的生活，以及能夠讓人類發揮其能力等概念為目標。



就筆者的角度來說，蘇格拉底的思想中固然蘊藏著民主素養的種子，然而這並不能完全等同於蘇格拉底就是一位崇尚民主政治的民主人士。

再則，Nussbaum 認為，蘇格拉底的「受檢驗的生活」是民主政治的主要教育目標，而蘇格拉底式的課程則必須在希臘與羅馬的斯多噶派的著作裡才看得清楚；Nussbaum 甚至進一步論述，正是由於斯多噶學派的思想家實際參與了教育制度和其他制度的設計，所以除了可以在他們身上清楚看到蘇格拉底的目標是如何落實外，現代博雅教育的構想也是由他們發展而出的。但若就筆者所知的教育史角度來觀察，西方的博雅教育課程應有兩個源頭，一是以希臘三哲為主的哲學家（philosophers）傳統，另以則是以辯者（sophists）與 Isocrates 所代表的雄辯家（orators）傳統；前者屬理念的導航者，對於理性及普遍真理有著高度的尊崇，後者則較與課程的實質設計及實施有關。談論西方博雅教育的源頭及傳統，若是只根據哲學家的傳統（甚至此一哲學家的傳統還跳過了柏拉圖），而忽略了雄辯家傳統，則就會略有不夠周全之憾。

Nussbaum 的論述另個值得討論的，是涉及其所列出的三項公民能力之問題。惟「這三項公民能力是否足夠？」的問題不是筆者所欲探討的重點，因為連 Nussbaum 自己都承認，在現代的社會中，身為一位睿智的公民其所需能力當然不限這三項，其他如對於自然科學的知識，乃至於社會科學中的經濟學等，甚至現代人的社會科學該具備到何種程度等問題，均非她在本書中所要論述的內容。因 Nussbaum 在本書中所作的，只是要列出其所認定之三項最重要公民能力而已。雖然如此，筆者更關注的是此三種公民能力該如何教育或培育的問題。筆者的看法則是，Nussbaum 所提的無論是「蘇格拉底式的自我檢驗」、「世界公民」以及「敘事的想像力」，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透過「智識性」的探究所取得的能力，其中「蘇格拉底式的自我檢驗」是透過哲學的教育，「世界公民」則是透過多元文化的教育，即便是與藝術作品最為貼近的「敘事性想像」，主要也都是透過文學作品的閱讀來取得的。當然在進行哲學教育、多元文化教育以及文學作品的鑑賞時，教學方法可以包含認知、情意及技能等多元化的學習方式，然而此種以認識他人或是異文化為主的學習活動，若是能夠結合以實際的對於他人、少數或弱勢族群以及其他文化群體的關懷或服務學習活動，或許可以更加深入學生的內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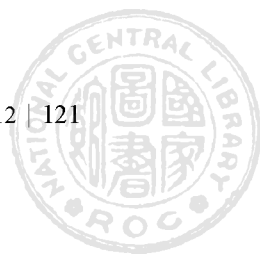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Nussbaum 似乎堅信，只要透過對於另一種陌生文化或傳統的探究，產生基本的瞭解後，就可以蘊育出蘇格拉底式的知識——讓學生知道自己的限制。不過她又同時認為，世界公民並不要求，也不應該要求我們不去批評別人或別的文化。兩者合在一起，也就是世界公民必須先做到了「尊重和理解，之後才去批評」。我們固然可以了解 Nussbaum 的用心良苦，然而從人類歷史的真實情形來看，當人們對另種文化有了基本的瞭解，未必能立刻將此種瞭解轉化為認識自



我限制的蘇格拉底式的知識，有時它反會伴隨著另種的可能性——文化或武力的侵略，特別是當此種對於其他文化的理解，尚結合了西方對於共同人性的理解（例如理性、自由、民主、進步等觀念）時，反可能加深了「白種人負擔」的優越感，而這也正是近代西方殖民主義乃至兩次世界大戰出現的重要原因。筆者的看法是，當人們對於其他的文化或價值觀有所理解後，並不一定自然地就會回歸到對於共通人性的認識或是信仰，它未必如 Nussbaum 所相信的，一定會去拒斥文化相對主義，也未必如她所預期的，必然能如蘇格拉底一樣去體會到自我的限制，有的時候，它可能會發生反效果，特別是沒有配合上適當的教學方法之時。

肆、結論

走筆至此，也許讀者會問，若是不加強 Nussbaum 所強調的三項公民能力，難道還有其他可行的作法嗎？其實筆者在前述的討論，並不在完全否定 Nussbaum 所提出的「培育人文」之教育目標及其相關的能力主張。相反的，筆者相信，若從教育活動的本質來看，教育本就是「價值導向」的活動，一味地強調後現代的「價值相對」，其實並無益於教育目標的具體實現。就此點來看，Nussbaum 所強調的倫理普遍主義式的共通人性或理性的觀念，可能在教育活動的進行上更具有推展的價值；只不過在培育的教育方法上，或許可以更加多元化，而不一定僅限於智識性的學習上。最後，筆者要強調的是，從一個與 Nussbaum 身處在不同文化傳統及社會背景的教育和學術工作者的身分出發，藉著《培育人文》一書的啟發，我們或許可以重新思索或建構一個不同於——當然，基於共通人性的觀點，不一定完全不同——西方文化傳統的博雅及通識教育目標，並且與 Nussbaum 所代表的西方傳統進行對話。促成不同文化及哲學傳統間關於普遍人性價值的對話，這或許才是 Nussbaum 寫作本書的最重要目的。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王俊斌：〈潛能取向理論與教育公平性問題〉，《教育與社會研究》，第 13 期，2007.6，頁 41-70。
- Nussbaum, M. C.：《正義的界限》，徐子婷、楊雅婷、何景榮譯，臺北：韋伯出版社，2008。
- ：《培育人文——人文教育改革的古典辯護》，孫善豪譯，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
- Burbules, N. C.. “Book Review – 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 by Martha C. Nussbaum.”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9.4 (1999): 456-66.
- Nussbaum, M. C.. *Cultivating Humanity –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